



摇

中共深圳市委

编者按：

正如我们有时对历史的感受来自于具体的细节一样，我们对于10年之前发生在中国南方的这场特别政治举动的思考更多停留在我们对现实生活的变化点滴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次讲话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伟人的影响，更多是体现在普通公民的心灵深处。

在中国政坛上，凭借独特的权威，在特别的场合，在特殊的时候以特别的方式阐述在今天大家看来显为常识的道理，并一举结束在认识层面的争论，此举都可谓空前。而南巡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家威望和大众的高度认可，也同样让后人惊奇。

伟人的伟大之处往往在于他告诉我们一些大家心里都明白的道理，而伟人之伟大也往往在之后，在更长的时间之后，才能让后人慢慢感受。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特别报道的重要理由。

谨此纪念邓公，并表达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敬意。

图:Photocome.com提供

“后伟人时代” 的第一个十年

——邓小平南巡 10 周年记

□凌志军（北京）

“后伟人时代”的开端

200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南风窗》驻北京记者打电话来说，今年是邓小平南巡10周年。若不是他的提醒，我竟忘了这个日子。这以后的几天，屡屡对朋友提及这事，他们也都不记得了，而且同我一样地惊讶：怎么会淡漠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中国人喜欢以整数来纪念那些对他们的生活发生过影响的日子，也即所谓“5周年”，“10周年”，还有“20年”、“50年”、“80年”、“100年”等。严格地说，这类“整数”同历史本来的进程以及我们的认识并无直接关联。比如，我们把“10年”作为一个参照，显然不是因为“9年”或者“11年”就会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而是缘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习惯。这习惯的值得称道之处，是它提供了一个契机和一种压力，让我们去回顾某些不该遗忘的事情。

所谓“邓小平南巡”，是指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时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大家之所以对这个事件记忆犹新，是因为，邓的这个举动在当时即令所有中国人大感意外；也因为，他那一路的讲话具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和感召力；还因为，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行动和那些出人意料的讲话，对当日中国产生了一种拨正航向的作用，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新政治运动，从此偃旗息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从此理直气壮，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改革的先驱者，诸如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以及温州和泉州这样的民营经济繁荣地区，

也都重振昔日气概。从那以后到今天，邓一手缔造的这种改革开放的势头，竟能保持10年而无起伏，甚至不会因为他的告别人世而发生逆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下面这一句话也许不算过分：

听君一席话，
十年保平安。

这样看来，在“后伟人时代”的第一个十年里，伟人的影响不仅还存在着，而且是广大深远而又无微不至的。

“后伟人时代”是我本人杜撰的一个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时代。它的含义是，即使伟人已去，社会却依然保留着伟人的影响，有如“后农业时代”中农业依然重要、“后工业时代”中工业依然繁荣。

有两个日子我们难以忘记。

1989年11月9日，这是邓小平正式退休的日子。4天以后，他会见日本经济访华团的时候，宣布他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这里所谓“百分之百”，按照邓本人的说法，乃是“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所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个消息的时候说：“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97年的2月19日是邓小平的忌日。邓去世的那个傍晚，京城晴空万里，日月东西相向，天地俱澄澈。我沿着京城的长安大街走到天安门广场上，内心里面不断想起毛泽东逝世的那个日子，也即1976年9月9日。较之20年前的那个时刻，这一天中国人的反应，其实并不是悲天恻地，而是平静。

平心而论，在本世纪中国的历史上，邓小平的影响和贡献，是不逊于另外一个伟人毛泽东的。中国人都喜欢把邓小平

和毛泽东做比较。他自己也有意无意地这样做，比如他把毛看作是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现在，在他去世5年之后，我们再来比较，就会发现，邓和毛之间的不同，要比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更加值得回味。这些不同之处中最重要的一个，正是在他们去世之后显现出来的。毛去世后的5年里，我们的国家动荡不已，从北京中南海里的一连串变故，直到偏僻乡村中人民公社社员的群起反叛，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天翻地覆的感觉。而邓去世后的这5年，我们却感受着平静和从容。一切都像他去世那一天的情景一样。

导致这种不同结局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样的。但若追究起来，有一件事情必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邓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他身后的中国定下了基调。他多次说，那是他的“政治交代”，这话语里面，其实就有“政治遗嘱”的含义。相对于毛泽东留下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邓留下的这一篇“政治交代”，显然是以完全不同的方针和逻辑来引导中国的走向。他的文选以他的这段讲话为终结，本身就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后人又以这个讲话作为“新时代”的开始，亦发挥着“舍此无他途”的作用。

今天我们回看“后伟人时代”的第一个十年，举大体不论细节，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不再折腾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把中国20余年的改革开放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那以前的整个80年代，是中国改革



的第一次浪潮；从那以后，直到2001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这1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既没有出现80年代初期那种令人兴奋的腾飞，也没有出现80年代后期那种令人沮丧的坠落。总的看，经济总量实现了第二个翻番。商品短缺的历史也终于变成了商品相对过剩。13亿中国人当中，有大约1亿多人已经富裕或者比较富裕起来，成为中国人所说的“大款”、“高收入者”或者是“中产者”。另外1亿多贫困者中，也有90%的部分，能够在丰年得到温饱，遇灾年也不至于饿死道边。除了这最富裕的部分和最贫穷的部分，还有至少10亿人，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实现了“小康”。这让老百姓有些不以为然，至少是觉得，这“小康”在当初成为“战略目标”的时候，是那么令人激动，及至说“实现了”的时候，方知不过如此。在我看来，这种淡漠的反映，要么是由于普通人当初把“小康”想得过于美好，要么是那些不普通的人后来把“小康”变得更加现实。无论哪一种，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确是进步了。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这10年的中国，在政治方面，没有左右摇摆；在经济方面，没有大起大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种局面，那就是：我们终于不再折腾了。

这里所谓“没有左右摇摆”和“没有大起大落”，首先是相对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这一段历史说的。

1992年初，当邓小平巡视南方的时候，整个中国，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处在低谷。那种沉闷、彷徨、疑虑和无所适从的气氛，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

众所周知，在中国，北方以北京为中心，一向是政治的热闹所在，也是诸种方针和口号的发源地。南方靠沿海一线，则是经济格外活跃的地方，所以，中国有“北政南商”的说法。南边经济的阴晴，多由北方政治的风云来牵扯，所以，若论南北大局，大致为北呼而南应，北行而南效。但是，在1992年早春，这局面居然转了过来，变作“南呼北应”，“南行北效”。所有这些集合起来，南北东西，浩浩荡荡，由此也

就令中国改革卷起了第二次浪潮。当时的舆论说，这种震撼整个中国的力量，乃是由南向北的“邓旋风”所推动。这并不是夸张之辞。

到今天，政治方面的中国，经历了1992年秋天的“十四大”，1997年秋天的“十五大”，1998年春天的“政府换届”，大致上是始终如一的势头，没有重复80年代那种左右不定，起伏无常的毛病。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经济方面的中国，尽管有1993年的“过热”和“通胀”，但其波动幅度明显小于80年代，以后的治理，也没有治出90年代初期那种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举的结果。然后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1年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中国竟然都没有跟着“风暴”和“衰退”，这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也让我们自己人惊叹：过去几十年，是人家不动荡而我们动荡；最近这10年，是人家动荡而我们不动荡。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经济方面种种数字的累加一如既往，当然，这其中有着过去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一切为基础，不能视作这10年的独有风骚，惟有“持续稳定”这4个字，当得起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就此看来，这10年里中国的基本特征是持续稳定，而不是大跃进。然则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持续稳定”是比“大跃进”更加令人激动的。在这之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10年，是政治上的反右派和经济上的大跃进；第二个10年和第三个10年，是3000万人死于饥荒，以及至少3亿人受到政治牵累；然后是第四个10年，尽管有了改革开放的大政，也没有了大折腾，但小折腾还是隔三年就来一次——1983年、1986年和1989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10年不折腾”的历史，不容易！

“不折腾”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少有自己的创造。过去10年里面，举凡最重要的方针，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内政的还是外交的，都是继承前人的。比如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至最终放弃计划经济；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至最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比如以一国两制之方针收回香港和澳门；比如面对国际争端的韬光养

晦；比如申办奥运的成功和中国足球的冲出亚洲……以上种种情节，若说全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似有崇古抑今之嫌，但若说是前人开场后人做戏，则有充分的根据。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就说过：“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他还说，“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今天回头再看，这话表面上委婉从容，但却大有深意可鉴，实在是切中“中国病”的一剂良药。

第二个特征：没有权威

中国不再需要权威，邓小平虽然毕其一生没有直截了当地这样说，但看他晚年的为数不多的公开讲话，里面是包含着这个含义的。1989年11月他公开宣布“告别政治”的时候，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他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1992年南巡的时候，他又讲到这件事，反复地说，不要迷信老人。

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日，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中国的新任领导者也在多种场合宣布，中国的方向仍要由他来把握。然而，邓小平公开宣布他“告别政治”，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于领导中国的事。

然而邓小平的“告别政治”是有条件的。有如他自己在最后一次会见外国代表团时说的，中国近10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这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他的后继者听的。他的想法，无疑是要中国在他已经开辟的道路上走下去。倘若真的能够如此，那么，中国的政坛上有他没他都是一样。但若出现偏离这条道路的征兆，那就要出来说一说，这也就是1992年他的南巡讲话的背景。直到多年以后，党内一位很高层的理论家还对我谈起这件事。“为什么小平同志要讲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呢？”他自问自答道：“就是因为那时候有动摇的现象。”

当初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费尽心机，前



后历时近20年，选了4人，都不对头。第一个被他自己打倒了，第二个背叛了他，第三个被第四个抓了起来，第四个在邓小平崛起之时辞了职。邓小平的接班并非毛的选择，但却非常对头。后来轮到邓小平来选接班人。前后10年，选了两个人，又不对头。邓在南巡的时候曾经感叹这件事。他说，靠一代人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要找第三代。今天回头看，“长治久安”这件事，邓小平做得更好。

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了天安门广场，让中国人世代瞻仰；邓小平的后人却把他撒向了大海，让他杳无踪迹。看来，邓小平是不愿为自己身后的中国留下权威的。到如今，他不在人世已经整整5年。我们的国家仍在进步着。

没有留下权威的人却留下了“长治久安”，这是值得后人好好想一想的。

第三个特征：不搞争论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不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那里，我提到，尽管邓小平说过“不争论”，但方方面面的争论仍然沸沸扬扬。我还把那些年发生在中国的最重要的争论，归结为几个焦点。

比如“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

比如“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

比如“市场经济是魔鬼还是天使？”

比如“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导？”

比如“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

义？”

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单干风’？”

……

10年以后再来看，这些问题都有了结论。总的趋向是，原来被看作异端的想法，如今都被接受了，其中很多已经成为大家正在做的事。

记得1991年，我的一个朋友从欧洲回来，问我中国人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最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姓社”还是“姓资”。他听了就觉得很好笑，还说这在欧洲人当中是不可想像的事。10年以后，我由这件事情联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拿了这个问题，和中国的年轻人去讨论，他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好笑呢？

就整个国家的社会心理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进步。共产党立国52年，前42年都是争论不休。今天“一贯正确”的，到了明天，就有可能全都错了。今天是错误的甚至反动的，到了明天，就有可能成了什么方面的“先行者”。这后面的10年，中国人不再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有了以往多年的教训，我们正在变得聪明起来，也懂了一个常识：那种硬要辨别是非分清敌友的做法，最后总是适得其反。

举个普通人的例子。户籍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必须改变，在今天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根据我的有限的消息来源，至少有福建和湖南两省，已在全省范围内取消了户口的界定，其余大多数省市区也在局部地区或疾或缓地对其加以改革。但是，

就在10年以前，有一个人却因为批评了户籍制度，被判有罪并且被监禁。他叫黄庆，先是昆明市搪瓷厂的团委书记，后来又是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秘书，由于工作的努力和卓有成效而多次受到上级表彰。他的命运转折，是因为撰写了一篇文章抨击中国的户籍制度。他认为户籍将公民分为高低贵贱，是一种不公正的歧视性制度，应予改革。1991年12月5日，黄被警察逮捕收监。根据“工人日报天讯在线”一位记者的报道，次年4月，在一次不公开的审理中，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6个月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黄的罪名成立，管制2年。等到管制期满走出看守所的时候，黄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和原来的地位，衣食无着，艰难度日。与此同时，他所批评的户籍制度，却在他的身边悄悄地改变着。到今天，已经没有人还会说那是一个不能被批评被反对的制度。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从那时以来的10年已经证明，这对国家的进步有好处。有时候，对于一些走在时代前面、敢于独树一帜、并且因此受了委屈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种绝对公平的选择。我们国家处理纷争的办法，不是追求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而是追求大局的平衡。这中间的道理不在于是非分明，而在于必行的策略。

当然，“不争论”不等于就没有问题。今日中国，人们思想上被束缚的情况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也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说法。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分歧，而是在于，在一种尚未建立充分民主的环境中，解决众人间存在的纷争，找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方针，使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这正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既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他的一个挑战。懂得了这一点，就有可能更深更远地理解邓小平本人一生的沉浮，以及他给我们后来人留下的精神遗产。^[1]

（作者为《人民日报》主任记者，著有《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兴起和衰亡》、《交锋》（与马立诚合著）、《沉浮》等作品）